

文獻學叢刊

# 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

侯美珍 著



臺灣

學生書局印行

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

侯美珍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

侯美珍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14.04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611-0(平裝)

1. 科舉 2. 試題 3. 明代

573.4416

103006666

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

著 作 者：侯 美 珍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楊 雲 龍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928185  
傳 真：(02)23928105  
E-mail：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本 書 局 登 記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九八八巷十七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新臺幣四五〇元

西 元 二 〇 一 四 年 四 月 初 版

57317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611-0(平裝)

# 自序

從事科舉的研究，純屬偶然。

在政治大學碩、博士班就讀時，筆者關注的是經學。因撰寫博士論文《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之需，開始留心「評點」，進而注意到明、清論及評點時，慣用「時文之法」、「時文之習」來概括。當時對科舉的認識極粗淺，既不懂時文、科舉，又怎麼能理解「時文之法」、「時文之習」的批評意涵？八股文不只束縛了明、清的考生，也困擾著西元 2000 年之際，對八股文一無所知的研究生。——老實說，八股文也是讓我博士班讀了八年的「罪魁」。

當時科舉學遠不如現在興盛，專著不多，而且多屬概論的性質。指導教授林慶彰老師，借我王凱符《八股文概說》，可想而知，裡頭並沒有我要的答案。但就是從這一步開始，跨入了科舉研究的領域。

那時《四庫》系列的大部叢書，如：《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書叢刊》陸續印行，曾花了很多時間翻閱古籍中散見的科舉文獻。常覺得自己像背著籃子的採集者，進入榛莽，在混沌中前進。迷茫和困惑，如煙嵐時時繚繞；然而，偶爾採得一把野菜，偶爾發現幾顆果子，盈筐的欣喜，令人忘卻腳步的踉蹌。誠如鄧嗣禹（1905—1988）所言：「中國載籍，言及考試者，幾於無書無之。」也幸得如此，科舉榛莽中的探險，在不見天光時，也能心懷著盼望。

2004 年完成博論後，隨即用沿路的採集，炒了一道：〈毛奇齡《季跪小品制文引》析論——兼談「稗官野乘，悉為制義新編」的意涵〉。新手下廚，該怎麼上菜？本應自揣淺陋，投稿一般的學報；也並非「初生之犢不畏虎」，純粹是考量臺灣研究科舉、八股文的很少，而臺大葉國良、梅家玲教授，都發表過八股文的學術論文，前臺灣文學館館長、現任臺南市教育局局長的鄭邦鎮

老師，其博士論文《明代前期八股文形構研究》，也是臺大的博士學位。「不如投稿《臺大中文學報》吧！即使沒上，聽聽專家的意見也好。」該文順利在 2004 年底刊登，陸續在《臺大中文學報》共發表了四篇。筆者與臺大中文系並無淵源，得力於這些發表的「加持」，讓後續申請國科會計畫、應徵成功大學中文系，有了支持的後盾。

2004 年以來，申請了八次國科會計畫，都是與科舉相關的主題，感謝國科會研究經費的補助，讓研究可以順利進行，也讓筆者在「寫計畫／研究／發表／結案」的周而復始中，累積了對科舉的認識。感謝近幾年來，各學報的編輯及匿名評審——不管投稿上或不上，認同或反對，都值得感謝。也謝謝各會議主辦單位的邀稿，尤其是 2011、2012、2013 分別在武漢大學、昆明、南京舉行的第八、九、十屆科舉會議，拜會了許多科舉研究的前輩，如李弘祺、李世愉、沈登苗、周臘生、郭培貴、張亞群、劉海峰教授等（請見諒不能一一列舉，以免成了「會議簽到簿」），讓筆者「閉門造車」之餘，也有向前輩請益、與同好切磋的機會。

筆者轉任成功大學中文系，即將屆滿五年。感謝成大中文系營造了一個和諧溫暖的工作環境，系上許多前輩的關懷、提攜，不敢或忘。與諸多優秀的學者共事，也讓筆者五年來不敢鬆懈，兢兢業業，盼能跟上團隊的腳步。

因先前研究經學的背景使然，故對於制義的出題，特別關注。在天一閣收藏的鄉、會試錄印行後，即開始了試題的整理，前後持續進行了四、五年之久，感謝近幾年國科會助理的協助。各館所藏未刊行的鄉、會試錄，散在各地多處圖書館中，查詢、補抄的過程，承蒙吉林大學歷史系高福順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彭國忠教授、武漢大學文學院陳水雲教授等人之鼎力相助。

謝謝現任助理周婕敏、彭醴璃、顏嘉慧，及博士生何淑蘋在資料整理及校對上的協助。臺灣學生書局在 1967 年重印了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1969 年又編印了《明代登科錄彙編》，對科舉研究的推動，有目共睹。拙作能由臺灣學生書局出版，倍感榮幸，謝謝編輯陳蕙文小姐的連繫及付出。

筆者的研究得以進行，還要感謝諸多學者在科舉學、《詩經》學的奠基，以及許多科舉文獻的典藏、編纂、出版者。拙作雖立足於許多前輩的基礎上，

也參考了大量的文獻，但才疏學淺，闕漏不足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大雅君子，不吝指正。

筆者自 1992 年考入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班，2004 年博士班畢業，指南山下的政大校園裡，滿布年輕時的足跡。謝謝師長殷勤的澆灌，讓學術的幼苗，可以自由的滋長。博班畢業 10 年後，才推出這本小書，實愧對師長的栽培和期望。

追隨慶彰師治學，始自大學修習「治學方法」課程。20 餘年來，深受老師強調做學問要有問題意識、要立足於文獻的影響。在起步之初，能得到正確的導航，至今猶然受惠。老師對學術研究的執著、使命感，以及所締造的成績，高不可攀，讓美珍益發汗顏自己的渺小和不足。

序末，我還要特別謝謝大學時上杜詩課程的簡恩定老師。人們都說他是一個剛介的學者，在他驟然去世後，美珍常懷想起的卻是他兄長般的溫暖。

侯美珍誌於成功大學中文系

2014 年 4 月

# 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

## 目次

自序	1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從罷棄科舉到提倡「科舉學」	1
第二節 科舉文學與制義的研究	5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11
第二章 明代科舉與經學	15
第一節 明代鄉會試考試內容	15
第二節 科舉偏重考試經書的制義	22
第三節 會試《五經》錄中的比例	25
第四節 考官分經、分房取中	30
第五節 對《春秋》、《禮記》的優取	33
第六節 考生選考《五經》的權衡	44
第三章 鄉會試錄與試題的搜集	53
第一節 明代鄉會試錄的流通與館藏	53
第二節 各時期鄉會試科數及試題數統計	58
第四章 《詩經》試題長短的變化	65
第一節 鄉會試題目長短的調整	65
第二節 短題的趨盛與發展	69

第三節 晚明從短題到小題的演變	72
第五章 《詩經》義出題的分布	79
第一節 試題在各類中的分布	79
第二節 試題在正詩、變詩中的分布	85
第六章 鄉會試常見出題的詩篇	93
第一節 出題的熱門詩篇	93
第二節 出題偏重的內容分析	96
第七章 鄉會試罕見出題的詩篇	111
第一節 未見出題的〈風〉詩與「淫詩」	111
第二節 未見出題的〈雅〉、〈頌〉怨刺詩	120
第三節 考官出題的忌諱與頌美	125
第八章 考官出題偏重的影響	135
第一節 《詩經》出題集中造成選考者多	135
第二節 科舉用書反映考官出題的取捨	144
第三節 孫鼎《詩義集說》與科舉	148
第四節 孫鼎擇錄的經文與出題	151
第九章 結 論	159
附錄一：明代會試《詩經》義試題彙整	171
附錄二：明代鄉試《詩經》義試題彙整	189
附錄三：鄉會試出題與孫鼎《詩義集說》纂錄經文比較	273
附錄四：徐光啟《詩經傳稿》篇目	279
附錄五：陸師《陸麟度詩經真稿》篇目	287
引用書目	293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節 從罷棄科舉到提倡「科舉學」

科舉是源自隋、唐設科考試、選才任官的制度。倘以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建立進士科為起始，<sup>1</sup>截至光緒 31 年（1905）朝廷下令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科舉制度在中國實施了將近 1300 年之久。隨著朝代不同，因應時代之需求，科舉考試的辦法、考試內容，也屢經變更。所有的變更，皆為完善制度，儘量更公平、更防弊，而為多數人所認可。科舉能實施千年之久，可見其向多數人開放、公正的取士制度，深獲肯定。平民可透過科舉拔擢，提升地位，造成社會階層流動；朝廷以功名吸引、鼓勵各地人才報考，選錄菁英為國所用，可增加向心力，穩固政權。這些都遠比官位由世襲壟斷、或藉由薦舉取人更為公平、可行，更有利於國家的統治，對於教育的促進、社會的安定，也有實質的貢獻。

然而，科舉制度並不完美，還是存在著制度上及實施過程的弊端。李弘祺教授指出，科舉是中國傳統重視公平取才的一個重要制度，但考試上的公正並不表示社會真正的公平，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和報酬都給了少數科舉考試的優勝者，而不能將部分資源和報酬提供給其他領域的專家，因此造成偏頗、造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不公平現象，士子競求功名，也使得科舉考試

---

<sup>1</sup> 關於科舉制的起始朝代、時間，學界有不同的主張，參劉海峰：〈「科舉」含義與科舉制的起始年份〉，《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5 期，頁 70—77 轉頁 91。

變成非常激烈的競爭。<sup>2</sup>考官為甄別高下，出題益加瑣碎、刁難，所學、所考愈來愈遠離設科取士的本意、遠離任官所需能力。讓士子專力於考試技術的鑽研，而非真才實學的培养，對於人才與國力的提升，並無益處。

因所需官員是有限的，錄取的名額也受到限制，參與科舉的考生卻隨著人口增多、讀書備考者的增加而快速成長，使錄取更加困難。青雲得意者畢竟有限，落榜者眾多，失意之憤懣油然而生。加上科舉實施過程衍生的一些問題，如：薦牘、關節等弊端、學非所用的質疑，以致每逢國家危亂之際，往往將國家積弱之故，指向科舉無法甄拔人才，甚至認為科舉是敗壞學術、人才，導致國家傾覆的禍首。如身受亡國之痛的遺民顧炎武（1613—1682），在《日知錄》中痛斥：「八股行而古學棄」，「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sup>3</sup>

對科舉的抨擊，在清末時局動盪，內憂外患時，達到最高點。西學東漸，新學的衝擊，考試內容的不合時宜，加上科場出小題、截搭題以困厄諸生等積弊，也嚴重到難以忍受。康有為（1858—1927）曾自言六應童試見擯，受困於小題搭載文法中，並估計當時約有三百萬人處境與他相同，憤言：

若夫童試，惡習尤苛。斷剪經文，割截聖語。其小題有枯困縮腳之異，其搭題有截上截下之奇，其行文有釣伏渡挽之法。譬如《中庸》「及其廣大草木生之」，則上去「及其廣」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為題。如此之例，不可殫書，無理無情，以難學者。不止上侮聖言，試問：工之何益？而上自嘉、道，下迄同、光，舉國人士，

<sup>2</sup> 李弘祺：〈科舉研究的問題與期望〉，收入於劉海峰主編：《科舉百年祭》（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頁100—104。

<sup>3</sup> 見清·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頁9，〈朱子周易本義〉條；卷16，頁946，〈擬題〉條。

伏案揣摩，皆不出此「大草」之文法也。<sup>4</sup>

可見激烈的競爭，導致考試內容的僵化、不合理，竟以「大草」命題，確實難寫，就算寫得好也無益人才的造就。隨著應考者眾、錄取率低，考生屢試不中的憤怒轉為對科舉制度的指責、鄙棄，批評的聲浪，撼動了科舉制度，為這實施千年之久的制度畫下了句點。

然而，清末對科舉的負面觀感、評價，卻未隨著廢除科舉而停止，陳興德在《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中指出，「隨著科舉制度的廢止，科舉考試成為歷史記憶，晚清科舉觀亦為整個二十世紀的科舉評價確定了歷史基調」。<sup>5</sup>晚清科舉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馮桂芬（1809—1874）、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針對科舉積弊的抨擊。

民初以後，雖有部分學者正視科舉制度存在的事實及影響，如周作人（1885—1968）曾暢言八股研究的重要，說八股是中國文學史上承先啟後的一大關鍵，也是中國文化、文學的結晶，應加以研究。<sup>6</sup>如鄧定人、章中如、傅增湘（1872—1949）、陳東原（1902—1978）、盧前（1905—1951）等學者，也陸續出版了科舉論著，<sup>7</sup>但「當時主流的看法仍對科舉持否定態度」，<sup>8</sup>在棄舊揚新、反傳統的思潮影響下，一般民眾常視科舉制度為腐敗落後的根源。因此，相較

<sup>4</sup> 清·康有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清·康有為撰，麥仲華輯：《戊戌奏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宣統3年〔1911〕刊本），頁5。

<sup>5</sup> 參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頁33。

<sup>6</sup> 周作人：〈論八股文〉，《看雲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6月影印民國21年〔1932〕上海開明書店版），頁144。此文後署「十九年五月」。

<sup>7</sup> 鄧定人：《中國考試制度研究》（上海：民智書局，1929年5月）、章中如：《清代考試制度》（上海：黎明書局，1931年）、章中如：《清代考試制度資料》（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傅增湘：《清代殿試考略》（天津：大公報出版社，1933年）、陳東原：《中國科舉代之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盧前：《八股文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月）。

<sup>8</sup> 參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頁151。

於其他古代文史領域，科舉研究更常為負面印象掣肘。成見的糾葛，時局的動盪，使民初科舉研究拓展不易，諸人所作大都偏向概論性質。

進入五〇年代，當時大陸處在特殊的政治氛圍中，對學術研究產生全面的衝擊，尤其在文革前夕和期間，批判高考等考試制度，與對科舉制度的批判同時進行。盲目地「破四舊」、「反傳統」、「反封建」，使得歷來被歸為舊制度、傳統文化、封建文化的科舉制度，也被徹底否定了。以致於五〇至七〇年代，僅有三本科舉研究專書出版，發表的科舉研究論文不超過二十篇，成為科舉研究的「失語」期。<sup>9</sup>何忠禮教授曾言：「到了 50 年代至 70 年代，又由於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研究科舉制度的論著，揭露其弊病的多，做出些微肯定的幾乎沒有。」<sup>10</sup>劉海峰教授也指出：「在 1979 年之前，科舉研究是大陸學術研究的冷門，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舉只是一堆陳年歷史垃圾，即使要去撥弄，主要也是為了肅清其流毒。」<sup>11</sup>幸好在中國大陸以外，科舉研究仍持續進行。如臺灣在 1949—1969 年間，就出版了科舉學的專書 9 種，尚有學位論文 6 種問世，在研究資源有限的年代，誠屬難得。<sup>12</sup>

科舉研究直至近二、三十年才逐漸興盛，<sup>13</sup>劉海峰教授在 1992 年提出建立「科舉學」的構想，以期能深入研究這一內容廣博的專門領域，並使之系統化。陸續撰寫了〈「科舉學」芻議〉、〈「科舉學」發凡〉等文章，<sup>14</sup>以及

<sup>9</sup> 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頁 231—232。

<sup>10</sup> 何忠禮：〈二十世紀的中國科舉制度史研究〉，《歷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頁 142—155。

<sup>11</sup> 參劉海峰：〈中國大陸科舉研究的發展與演進〉，收入於高明士編：《東亞教育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年），頁 180。

<sup>12</sup> 參侯美珍：〈臺灣的科舉學〉，《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 6 期（2013 年 11 月），頁 86—95。

<sup>13</sup> 陳興德：《二十世紀科舉觀之變遷》，頁 318，引述劉海峰教授對 1926 年至 2005 年 7 月科舉學論著目錄的整理，經其歸納，1978 年後所出版的專著，佔總數的 82%，學位論文佔 93%，且隨著時代愈近，相關的著作愈多。

<sup>14</sup> 兩文分見劉海峰：《科舉制與科舉學》，頁 219—231；232—244。

《科舉學導論》一書，<sup>15</sup>獲得學界許多的支持和回響。再加上 2005 年恰逢廢除科舉百年，有許多相關報導、活動，<sup>16</sup>在回顧、反思光緒 31 年廢除的科舉制度之餘，也吸引更多世人關注科舉，加速了科舉學的發展。以科舉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陸續召開，帶動了研究的熱潮，至 2013 年 11 月在南京召開「第十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截止，已有十屆之多。而且有些會議雖以科舉為主題，但不計入此十次之數，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2006 年 12 月舉行「101：後科舉時代的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與北京臺灣會館於<sup>1</sup>2013 年 9 月合辦的「科舉制度在臺灣學術研討會」。武漢大學亦曾於 2008 年 11 月舉辦「明代文學與科舉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舉辦「俗文學中的科舉與民間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皆不在上述「十屆」之列，可見近十年來，科舉研究深獲學界矚目及科舉學術研討會舉辦之熱絡。

## 第二節 科舉文學與制義的研究

多方的努力，促成科舉研究的興盛，相關的著作，也大幅增加。試用「科舉」作為關鍵詞，搜索期刊論文及博、碩士論文，即可窺見由從前零星到近年蓬勃的研究狀況。雖目前研究者和著作數量，遠逾從前，但劉海峰教授嘗言：科舉學是與中國一千多年間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書籍和幾乎所有地區有關的一門學問。現有的研究成果，與科舉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和影響、資料的宏富程度相比，還是很不相稱。而且既有的撰著，也因種種因素，未能充分、深入研究，或者存在明顯的錯誤等待糾正和澄清，在涉及中國人文歷史的學問中，

---

<sup>15</sup> 劉海峰：《科舉學導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

<sup>16</sup> 在隔年，出版兩本以科舉百年為主題、雅俗共賞的書籍，一為《新京報》主編：《科舉百年》（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年 2 月），一為劉海峰主編：《科舉百年祭》，載錄了 2005 年報刊、會議中，諸多對科舉的論述。並可參《科舉百年祭》，頁 486—488，程克夷所撰〈後記〉對 2005 年科舉百年，新聞界、文化界、教育界、學術界的活動概介。

很少有像科舉這樣地位重要、文獻眾多，價值甚高卻尚未被充分研究者。<sup>17</sup>

科舉學是一門廣博、牽涉多種領域的學問，與古代歷史、教育、政治、社會、文化、文學等領域密切相關，因此可以讓不同專業的人，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以呈現科舉學的多元面向。以往科舉的研究者，以歷史學門及教育學門中研究古代教育的學者居多，也有一些是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者。近十餘年來，拜科舉研究興盛之賜，加上兩岸增設不少文史領域的研究所，論文數量倍增，相較於其他發展成熟的領域，科舉如同一片亟待開墾的榛莽之地，吸引了許多學者、研究生於科舉學領域中，尋覓新的課題。中文學界投入科舉研究的學者也快速增加，已逾教育、政治學門。<sup>18</sup>

許多文學史、學術史上的知名人物，多為博得功名之進士，少部分是舉人，即使是一生考不中舉人、以秀才終老的徐渭（1521—1593），科舉在其生命中，亦烙印了深刻的印記；困頓科場的蒲松齡（1640—1715）、吳敬梓（1701—1754），在其作品中，何嘗沒留下科舉的痕跡？科舉與文學關係十分密切，與中文學門相關的科舉文獻也不少，僅是應試文體，就有：試帖、律賦、詔、誥、表、判、論、策、八股文等多種。若論各類文體中涉及科舉的敘述，加上以狀元、進士、舉人等為主角的小說、戲劇等，就更不可勝計了。周興祿《宋代科舉詩詞研究》中指出，《全宋詩》中關於科舉題材內容的作品有 7000 餘首，《萬寶詩山》有應試詩約 16000 首，兩者共計約佔全部宋詩的 9%。<sup>19</sup>而孫仁義〈淺析京劇等狀元戲中的科舉影像〉一文，但取「京戲」一劇種，僅取

<sup>17</sup> 劉海峰：《科舉學導論》，頁 5。

<sup>18</sup> 以臺灣為例，拙作〈臺灣的科舉學〉一文中，以學位論文統計來觀察，臺灣的科舉研究，歷史學門是主力，早期還有不少政治專業的學者投入，近十餘年來，中文學界以科舉為題的學位論文，成長極為快速，從「1990—1999」、「2000—2009」、「2010 以後」，三個時期的學位論文來看，數量皆為各學門之冠。大陸科舉學界，中文系的學者、科舉學著作，所佔比例，也較從前增加許多。

<sup>19</sup> 周興祿：《宋代科舉詩詞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11 年 12 月），頁 7。

「狀元」一角色，統計京劇的狀元戲就多達 56 部，<sup>20</sup>可見涵蓋之廣、素材之多。

「科舉文學」也是科舉學研究的一環，<sup>21</sup>在許多中文學門的學者，投入科舉研究的行列後，這領域的論著，驟增不少。<sup>22</sup>但從事科舉文學研究者，似多偏愛探究傳奇、小說中的科舉素材，<sup>23</sup>其次是與科舉有關的詩賦，其他應試文體，大概是因比較困難，文本取得、解讀不易，也不似戲劇、小說有趣，較少獲得關注。筆者認為，應試文體中的制義一類，即是屬於極重要，然以往給予的關注、研究仍不足者<sup>1</sup>。

明、清科舉取士，鄉、會試分三場試士，考試內容雖涵蓋多種體裁，而中式與否的關鍵，取決於首場的制義。<sup>24</sup>制義有諸多別名，如：制藝、時義（藝）、近義（藝）、經義（藝）、舉業、時文、八比、八股文等。就其出題的難易、偏全、冠冕與否，可分為大題文、小題文；<sup>25</sup>就其從《四書》、《五

<sup>20</sup> 孫仁義：〈淺析京劇等狀元戲中的科舉影像〉，《運城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3 期（2011 年 6 月），頁 32—36。按：狀元戲之命名，只有少數劇名出現「狀元」等科舉字眼。

<sup>21</sup> 科舉與文學的議題，可參劉海峰兩文：〈科舉文學與「科舉學」〉，《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62 卷第 2 期（2009 年 3 月），頁 176—182；〈科舉學與科舉文學的關聯互動〉，《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6 期，頁 25—32。

<sup>22</sup> 部分研究成果，可參方憲：〈近十年國內關於科舉與文學的研究綜述〉，收入於陳新、余來明主編：《科舉文獻整理與研究：第八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405—417。

<sup>23</sup> 尤其是《儒林外史》，僅臺灣在 2009、2010 年兩年間就有三本碩士論文，分別為吳明勳：《從科舉功名與禮教來看儒林外史》（高雄：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龔顯宗指導）、吳政憲：《儒林外史中科舉制度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回流中文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年 6 月，羅克洲指導）、陳寶惠：《從儒林外史透視清代科舉》（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年 6 月，柯金虎指導）。

<sup>24</sup> 參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sup>25</sup> 參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3—198。

經》出題的不同，又可分為《四書》義（藝）和《五經》義（藝）。《五經》義又因經書之別，分作《易》義（藝）、《詩》義（藝）……等。

科場雖重制義，但明、清之文集，常見收錄論、策等科舉文體，但卻以不收制義為常態。歸有光（1507—1571）公認為明代首屈一指的制義名家，然而歸氏文集有「應制論」、「應制策」，卻未收任何一篇制義。<sup>26</sup>所謂「文集附時藝，近今罕有」，<sup>27</sup>乾隆 40 年（1775）上諭曰：

時文為舉業所習，自前明以來，通人擅長者甚多，然亦止可聽其另集專行，不宜並登文集。<sup>28</sup>

至清末猶有「近代通例，別集不收時文」<sup>29</sup>的慣例，可見時文不登文集，為明、清兩代絕大多數文集編纂的常規，甚至有主張連時文序也不必收者。<sup>30</sup>由於時文多「另集專行」，這讓我們在閱讀古人文集、研究其人作品時，常忽略其制義。因為時文善變之故，過時即不受青睞，故「另集專行」的制義選集，易遭淘汰，傳世罕少。商衍鎰（1875—1963）曾言時文選集等科舉用書，「自明至清，汗牛充棟之文，不可以數計。但藏書家不重，目錄學不講，圖書館不

<sup>26</sup> 明·歸有光撰，周本淳校點：《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8 月），「應制論」見〈別集〉，卷 1，頁 687—726；「應制策」見〈別集〉，卷 2 上、下，頁 763—786。

<sup>27</sup> 清·洪若皋受業弟子輯：〈凡例〉，清·洪若皋：《南沙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卷前，頁 7。

<sup>28</sup> 清·王先謙：《東華續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 10 年〔1884〕王氏刻本），〈乾隆八十二〉，頁 31。

<sup>29</sup> 按：此為清道光 9 年（1829）陸錫智為嚴可均選一卷時文所作卷前識語，見清·嚴可均：《鐵橋漫稿》（《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 18 年〔1838〕四錄堂刻本），卷 13，頁 1。

<sup>30</sup> 明、清文集不收時文、或主張連時文序皆不必收，及時文選集不易傳世的緣故，詳參侯美珍：〈談八股文的研究與文獻〉，《中國學術年刊》第 30 期（春季號）（2008 年 3 月），頁 167—198。

收」。<sup>31</sup>以致在廢除科舉後，世人對制義更加陌生，但負面觀感卻仍根深柢固的盤據著。

啟功（1912—2005）嘗云：曾遇到用「八股」這二字作為貶義詞的人，「竟不知它是一種文體的名稱，更不用說八股為什麼那麼壞的理由了」。<sup>32</sup>涂經詒曾感慨中、外版的中國文學史，「要不是全然無視於這種文體的存在，就是用最不經意的介紹，來予以最大的輕蔑」。<sup>33</sup>鄭健行也指出，在九十年代前，由於學者對八股文的發展過程和文體本身無確切的認識，常執定全盤否定八股文的成見，只要有必須列舉負面因素處，便把八股文當作其中一項任意加插進去，而不論實情為何。<sup>34</sup>以上諸位學者指出今人對制義陌生、忽視，可是謾罵、輕蔑卻不遺餘力。客觀看來，制義雖有其負面的影響，但忽略，或者謾罵、栽贓式的評論，究竟不是學術研究應有的態度。

隨著中文學門的學者對科舉研究投入漸多後，研究制義的專著、學位論文也陸續增加。考察學者的論題，似較留意制義與文學的關係，制義對詩文、戲曲、小說、批評等影響，都有所關注。然制義可探討者，固不僅限於文學一端，涂經詒認為，從中國思想史的觀點來說，許多八股文中的材料，是研究明清孔孟儒家學說、尤其是理學的豐富寶藏。<sup>35</sup>葉國良教授也指出，八股文「很像宋代某些不事訓詁、發抒經旨的經學著作」，認為可將八股文「視為儒學研

<sup>31</sup> 商衍鑒：《清代科舉考試述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影印1958年北京三聯書店本），頁227。

<sup>32</sup> 啟功：〈說八股〉，收入於啟功等合撰：《說八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7月），頁1。

<sup>33</sup> 涂經詒撰，鄭邦鎮譯：〈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中外文學》第12卷第12期（1984年5月），頁167。

<sup>34</sup> 鄭健行：〈談八股文體與其發展歷史——九十年代前大陸學者對八股文的態度和認識〉，《科舉考試文體論稿：律賦與八股文》（臺北：臺灣書店，1999年5月），頁255—267。

<sup>35</sup> 涂經詒撰，鄭邦鎮譯：〈從文學觀點論八股文〉，頁175。